裴景福：从人生苦旅逆袭到收藏大家

王国信

裴景福(1854—1926)，字伯谦，安徽霍邱县新店埠人。清同治十二年(1872)拔贡朝考一等，光绪五年(1879)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不过他还不知道，和他同榜考中进士的，还有未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光绪十八年(1892)，裴景福改官广东知县，先后补陆丰、番禺、潮阳、南海四县县令。所至之处，“举重若轻，治之裕如”“皆著声绩”。“凡讼狱涉疑难，他人屡鞫而不能决者，景福以数语了之。”但是家风使然，他对官场的蝇营狗苟，并不感冒。他的父亲裴大中，曾任上海知县，最大的爱好不是钻营升官，而是热爱风水堪舆，后来弃官隐居，专事学问。

裴景福和他父亲一样不爱钻研权术，他最大的兴趣是赏玩文玩。他的这个爱好也给他带来了麻烦。1904年，岑春煊当了两广总督，裴景福过往收藏上与其有隙，岑春煊暗示下属给裴景福罗织了一条贪污罪，收禁于番禺。岑春煊继续上奏弹劾，终将裴景福流放新疆，并不准生还。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议处谪戍新疆，次年四月抵迪化(今乌鲁木齐)戍所。

裴景福到新疆乌鲁木齐后，应新疆巡抚联魁之召，为其幕宾。居抚署西厅之南屋，直至赦归。裴景福在乌鲁木齐约三年间，与布政使王树枏、谪戍的广西提督苏元春、流放的前辅国公载澜过从较多，曾参加编修新疆图志等工作。宣统元年(1909)，给事中李灼华上疏为其伸雪。此年七月，裴景福得以赦免。赦归后，卜居无锡，以金石书画自娱。1914年，出任安徽省公署秘书长，又升任政务厅长。1926年去世，享年72岁。作有《睫闇诗钞》《河海昆仑录》《壮陶阁书画录》，镌有《壮陶阁帖》六十四册，为世所珍。

裴景福的不凡之处在于他把人生苦旅写成了一本名著——《河海昆仑录》。《河海昆仑录》是我国近代史地研究中备受瞩目的一部杰作，是作者远赴戍所——新疆途中的记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七日，裴景福由广州起程，经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八到达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一路上，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程。临行前，他做了两只青布口袋，随身携带，凡“道途之所经历，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斗，逐日为记，悉纳之囊中。”其行程始于南海，中经黄河，最后抵达昆仑山之境。行程11720余里，共370余天。书中记行、叙事、写景、言志、抒情、诗文互映，情事互补；自然风光、民情风俗、时事、历史、舆地、军事、外交、绘画、书法、古玩鉴赏，乃至于股票，无所不包。而论为人，谈治学，更是见识深刻。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裴景福到达新疆乌鲁木齐的当年，即把苦旅日记整理集而成书，书名为《河海昆仑录》。作者自谓书名来由是取其诗“难从碧海求神药，再溯黄河问女牛”，“一笑何时便脱去，芒鞋蹑起到昆仑”之意，即其行程始于南海，中经黄河，最后抵达昆仑山之境。全书分四卷，只有卷一的一部分记述了广州至河南的行程，其他均记由陕西、甘肃到新疆一路的所见所闻。宣统元年(1909)，《河海昆仑录》出版。

身为“囚犯”的裴景福，以满腔的热情关注祖国山河，所以在他的笔下，巍峨的群山、无垠的荒原，尽显“边塞莽苍光明气象”；茫茫的戈壁、萧索的大漠也是一片净海，能使人忘却严寒，战胜苦难，灵魂得到升华，精神为之陶醉。而全书文字的优美，也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而读者在领略其优美文字的同时，也会有所共鸣。

裴景福过陕西后，记述尤其详尽。纪行叙事，写景抒情，诗文相映，异彩纷呈，堪称近代游记作品之佳制。如《发泾州》：

尘土欺人可奈何，帽檐斜欹自高歌。秋风芳草悲青冢，春雨桃花照黑河。

乘传急驰蒲类马，归装稳送木兰驼。泾堤南畔千株柳，莫忘征夫载酒过。

裴景福作诗之外，又做了这样的描绘：入泾州数十里，杨柳夹道，疏密不断……夹路柳荫张幕，平畴麦苗铺毡。西日将沉，红霞漫天，群驼背负棉囊，行万绿丛中，起伏蠕动，如千丈白龙，游戏碧海，真洞心骇目之观。

身处逆境、苦境的裴景福，在感叹声中，揭示着做人行事的哲理：“天下最凄清最惨淡之境，处之最有味；最炫耀最快足之境，如自以为有味，则最凄惨、最抑郁之境即肇乎其中。为民牧者更宜加意，盖我所炫耀、快足者，而小民此时已凄惨抑郁矣，我之最凄惨抑郁，已播种于此时矣。人苦不觉察耳，偶有所触，书以自警。”他的自警，何尝不是警钟长鸣!

裴景福写自己一路不畏艰难险阻，能将山川风物尽收笔底写“吾心”的缘由与动力：“仆自粤将赴戍所，友人范仲林手《皇舆西域图志》一书赠行，曰：‘子万里行，不可无作，子有作，万里即为子有矣。’仆曰：‘万境入于目，印于脑，而达于心，其能肖境者，必能造境者也。万里之境与人同，寸心之境与人异，吾但写吾心而已。’”又曰：“综自乙巳年三月二十七日自广州省城始，逮次年四月初八日至新疆迪化府止，凡三百六十五日，行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余里，以我为主，以日为经，以地为纬，就目所睹，耳所食者，泚笔录之，附以诗篇，他日金鸡赐环，玉关生入，当举所录，以示仲林。”友人的鼓励，正是作者“万里即为子有”的动力。曾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枏，为《河海昆仑录》作序，赞曰：“夫伯谦遘人生不测之祸，处难堪之境，而仰高俯下，夷然泰然，长歌琅琅，声满天地，且其于是行也，深以壮遊万里，得践河海昆仑之讖，为平生幸事。”

1917年，裴景福坚持辞去一切社会职务，回归霍邱新店埠故里，将其住宅命名为耕善庄，开始着手编著《壮陶阁书画录》。翌年，裴景福所著诗集《睫闇诗抄》十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裴景福的诗属于桐城诗派，风格多样，注重炼字、炼句、炼意、炼格，精于声调之美及谋篇布局，具有一种雍容典雅、超凡脱俗的气质。诗歌艺术成就较高。特别在新疆期间，面对高山大川，瀚海黄沙，胸襟变得开放，做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作，如《哈密二首》其一：天山积雪冻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

1923年7月，裴景福所著《壮陶阁书画录》宣告完成。《壮陶阁书画录》又名《龙珠宝藏》，共计二十二卷，自1918年4月始纂，历时五年完成。不同于一般的书画著录，《壮陶阁书画录》不仅所记载的藏品极其丰富，且考订颇为谨细，评骘亦甚精微。所藏字画用三种图章志其品第，一曰“伯谦经眼”，属一般；二曰“裴氏珍藏”，属中品；三曰“实过明珠骏马”，属上品。书中记载裴景福所收藏之王翚《黄河流域图》《运河图》，钟繇《荐季直表》、王羲之《落水兰亭序》，被裴景福自称为是“裴氏四宝”。

金保权在为《壮陶阁书画录》作的序中说：吾师亦以名进士令广东大邑，先后垂三十年。世济其美廉，俸所入不治家人生产，独嗜古人书画，见辄购取，不惜重资，故收藏甲天下。鉴赏家咸推之。日本东邻文人艺士精于此道者，时时踵门求教，固无论矣。欧西法博士白希和，闻先生名，远造访于迪化，复至无锡取所藏精品影印百余种携归，夸耀于彼邦，其见重如此。曾镌有《壮陶阁帖》六十卷，耗金钱十余万，历四十余寒暑。论者谓足与《三希堂乾隆初拓》比美。从此段序文既可以看出裴景福的藏品之丰富，也能看出裴景福所藏书画影响范围之广。裴景福所作《壮陶阁书画录》实际上是为后世收藏时“判断真赝”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参照依据，这也是《壮陶阁书画录》的价值之所在。

沃土春晖

“张海式”治理水门塘

刘瑞明

唐书俊 摄

两年前，霍邱县境内发生的两件事令人关注：第一件事是全县六十年一遇大旱，农业生产基本稳产，确保了粮食安全；第二件事是城北的水门塘，历经多年改造亮化终于峻工，这一古老的水利工程再放光彩。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大灾之年无大碍，水利之功毋庸置疑。当我们漫步在风景怡人的水门塘畔时，会感叹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智慧，也会感念那些先贤们泽被后世的治水恩德。

张知县，名张海，浙江省钱塘人，大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在霍邱由县丞升任知县，任职三年，其间，修筑关洲口，重修儒学，修方志，尤以治理水门塘，政绩颇丰，为后世称颂。

水门塘，县东北十里，原周围二十里之阔，春秋时期楚令尹孙叔敖所建，又名大业陂，是著名的水利工程，所修之时早于寿县安丰塘，号称天下第一古塘。较早载录孙公治水功绩的文献为西汉刘安等所著《淮南子·人间训》，云：“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唐杜佑《通典》曰：“孙叔敖筑芍陂以兴水利。六、蓼之境，疏浚闸河，灌田万顷”。孙公开塘之说，也源于宋代章樵所注《古文苑》，云：《元和郡国志》载“寿州安丰县有芍陂，灌田万顷，与阳泉陂、大业陂并孙叔敖所作，叔敖庙在陂塘之上”。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距张海担任霍邱知县之日，水门塘修筑已2360余年，其现状为“所以备潴蓄而资灌溉也，附塘各保田畴咸利赖之。塘身日渐淤塞，蓄水无多，遇旱即涸”。也就是说此塘长久失修，很难发挥其蓄水灌溉的功能了。紧接着，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问题，“附近豪强遂群个侵占，夏则栽秧，冬则种麦”，结果是塘体被非法围田，几乎失去水利功能，“几欲尽先贤之遗泽而阡陌之，曾不计水利之关于农事者大也”。随后，依赖此塘生存的周边各保村民为了权益，开始长达百年的纷争与诉讼，政府虽然三令五申但仍屡禁不止，疲于应付，效果不佳，“仰水利于此塘者，曰水门塘、吉水湾、罗家亩、花家岗、三道冲，凡五保焉。各保士民以公塘被侵之故，于康熙、雍正年间，频讼于县。既而上控院司，俱饬禁止占种，碑文详案历历可稽，无如在官之文案虽炳存，而顽民觊觎之心未息也”。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张海面对的水门塘，已不是浇灌阡陌沃野的清流琼浆，更不是碧波荡漾锦鳞游泳的诗画美景，而是天怒人怨长达百年悬而未决的矛盾和纷争。所有的一切，似乎是上天在考验这位刚刚履新的知县大人。是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坐享清福，还是直面困难披荆斩棘勇毅前行？最后，他选择了后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顺天时从民意，他冷静思考，认真准备，精心谋划，综合治理，打出一套惊世骇俗的漂亮组合拳。

思想上，他高度重视，深刻了解治理工作的重大意义。“夫兴利除弊，长民之责也。苟有利之当兴，弊之当除，即不必沿袭前人陈迹，皆可自我创始。况前人已有开其先者，数千年资其利赖，而乃豪强窃踞，不能踵行而保护之，使前人之遗泽，几几湮没于今日，长民之谓何？”如果不能守好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造福百姓，而任其被豪强掠夺侵占，作为地方官员就是尸位素餐，渎职失职，正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组织上，他选贤任能，组建工作专班。方针已定，先择干部更是关键。“时有署开顺巡司张君纲，卓有才识，凡委理公事，悉能周祥妥协”，选调能力过硬、经验丰富、执行力超强的张纲(职务类似当代的公安派出所长)为专案组长，为下一步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行动上，他稳打稳扎，环环相扣，确保质效。先调阅卷宗，积极摸排，掌握第一手资料，“据张书盘等禀县，以前县丁公(丁恕，上一任知县，直隶文安举人)勘明，占户一百三十家，计种二百八十余石，每石追稻六石充公”，在充分利用上任工作打下的基础成果上，对被侵占的地亩及侵占户登记造册，全面了解，做到心中有数。“嗣署县杨公暨余莅任，先后追稻一千五百六十余石，变价九百八十两有奇，为修建塘埂及修道宪衙门之用”，继续追缴非法所得，没收充公，用于修塘支教等公益事业。“将为首占种之郭铨等四人，议拟惩创”，同时对为首的村霸塘霸等黑恶势力以予严惩，重拳出击，杀一儆百。“复节次谆切示禁，而冥顽不灵者罔鉴前车，旋萌故智”，加大宣传力度，增强警示教育，特殊预防和普通预防齐头并进，使法制效力最大化。“职奉檄往勘，先于周围塘田交界处，各立界堆。南齐学田，北至官庄，东西各高埂下，俱高立封堆。率令弓手眼，同士民约保塘长，沿边丈量，得塘身绵亘实有十九里八分。随于界堆之外，每里筑一堆，堆内为塘，堆以外为田”，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基层干部并邀请专业人士，公平公正，现场勘察划界，塘田之分，一目了然。

最后，完美收官，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达到高度统一，“士民尽皆悦服，取具各约，保塘长，永远不许争占，甘结祥履，并请立碑永禁等语，随批准立案，各结存卷”。专案结束后，制定村规民约，约法三章，发动群众自觉履行和相互监督，并勒石纪事，昭告乡邻。“是塘也，署巡检张君，可谓经画得宜，是佐长民非而清水利者，张君之力居多”，总结表彰，功归于下属，自己则淡薄名利。“夫侵占盗种，法所必惩；官湖民塘，例禁开垦，我国家久矣悬为令甲，继自今，如有附近豪强，仍前越界占种者，是顽梗不率之徒，罚无赦”，重申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加大处罚力度，从人文治理走向法制化。“至沿塘界堆，保无日久渐就坍颓，是必于每年农隙之时，责成塘长督率附塘居民，于塘心淤处开浚，即以塘土高培界堆，使之屹然在望，不可磨灭，先贤之遗泽所以备潴蓄资灌溉者，将永久而勿坏也”，开拓创新，建章立制，实行“塘长”负责制，进行后期维护和管理，做到可持续发展，永无后患。

纵观张知县成功办理水门塘非法围田一案，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执政能力和务实有效的工作作风，为霍邱治水贡献了“张海式”智慧，在270年后的今天，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霍邱人，仍有较大影响和借鉴意义。

霍邱，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南岸，南高北低，典型的江淮分水岭地貌，峰圆坡缓，垄畈相间。河汊虽多，但水低田高，无雨则旱，沿河洼地，一雨成灾，正如民谣所唱“洼地洪水滚滚流，岗上滴水贵如油，一方盼水水不来，一方恨水水不走”。“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上古时期的大禹，春秋时期的孙叔敖，至清朝的张海，新中国成立后“淠史杭”、淮河综合工程的无数建设者，无不为实现“水利之兴而后天下可平”的目标而殚精竭虑。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为有人负重前行！

当前，国家提倡的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理念，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绿水青山已成普遍共识。怎样更好地维持湖泊湿地等生态环境的平衡、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仍然是摆在当代霍邱人面前的老课题新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担当……

全省党史工作先进个人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二十九

自1979年恢复工作职务以后，雷伟和先后兼任中共六安地委皖西革命斗争史征集编写筹展领导组副组长、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小组副组长。1982年11月离休后，他仍担任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顾问职务。他积极主动，不遗余力地关心和支持党史研究、编写党史工作。

1980年11月，开始了《皖西革命史》的资料征集工作。雷伟和亲自带领编写人员深入大别山区，考察史实，探视遗址。

为激发编写人员的革命热情，让大家知道皖西革命为什么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道理，他特地安排同志们看了胭脂坳和白果湾的两处万人墓，讲述：国民党反动派于1932年间，在胭脂坳(今金寨县关庙乡胭脂村)一次枪杀500多名革命干部和群众；在白果树湾(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大村子，当时属于六安县六区)，国民党十一路军杀了300多人，两个刽子手从日出杀到日落，直到刀也砍卷了，人也砍累了，最后剩下两名手里抱着孩子的妇女才不得不停手。雷伟和这次见到幸存的两名妇女，她们已经是儿孙绕膝的老奶奶了。这血淋淋的事实，深深地印在了编写人员的脑海里。

为了进一步让编写人员认识到革命的艰苦，雷伟和不顾古稀高龄，拖着残疾的身躯，跋山涉水，沿着当年红二十八军第一、二、三路游击师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考察，先后到了金寨县的斑竹园、吴家店、古碑冲、熊家河、燕子河、花凉亭，霍山县的太阳畈、古佛堂、漫水河、诸佛庵，六安县的独山、龙门冲、苏家埠和霍邱县的白塔畈、下洛山等地。他一边看，一边召开“三老”(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基层干部)座谈会，获得许多珍贵史料。

皖西革命斗争史征集编写筹展领导组组织人员分赴北京、南京、合肥等省以上档案馆，查阅、摘抄、复印资料，访问340多位老干部，征集数百万文字资料。1979年，又组成地县联合调访组3个，分赴全国19个省市和七大军区调访202位老干部，整理出调访笔录139份，复印资料32份，填补大量史料空白，为开展皖西地方党史编研工作打下初步基础。

1982年6月1日，雷伟和向六安地委常委会议汇报中央党史办公室在南京召开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精神。安徽省规定地市党史办编制10-12人、县区党史办4-6人，而当时六安地委党史办只有两个人在应付门面，县委党史办只有两个是专职的，其他都是兼职的。很多事情搞不起来，有些文稿写好后也没有人打印。雷伟和向地委提出了贯彻意见，其中尽快做到人、钱、机构“三落实”是重要的一条。这次会议，对六安地区党史工作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1983年11月，《皖西革命史(征求意见稿)》编出后，雷伟和认真审阅，写了近万字的修改意见。特别对稿中“新四军四支队由于受王明路线影响没有迅速东进”这一重大提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引起编写组的重视，后来采纳了他的意见。1986年送审稿编出后，雷伟和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审查，又提出8点修改意见。1987年6月，《皖西革命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1988年获华东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二等奖，1992年获安徽省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皖西革命史》被专家们一致誉为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其中雷伟和的贡献毫无疑问是巨大的。

1980年，中央军委部署收集与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战史》的任务，由武汉军区具体组织，有关军区和军兵种协助进行。雷伟和是中央军委红二十八军战史编辑委员会57名成员之一。他多次陪同开国中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红二十八军战史编委会负责人林维先(被毛泽东赞誉为“游击专家”“民兵专家”)及工作组，深入大别山区实际调访，搜集并核实了大量革命历史资料。

对战史编辑，他坚持“求实成真”，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每一个史实。1982年7月，《红二十八军战史(初稿)》编出。初稿中有这样一句话：“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于1935年2月又重新组建了省委。”雷伟和查找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没有重建省委。对这重大的史实，他写信给战史编委会，意见被采纳了。林维先见到皖西的同志，高兴地说：“雷老为编写红二十八军战史办了一件好事。”

1985年4月，雷伟和被评为“全省党史先进工作者”。25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表彰大会，时任省委副书记卢荣景给雷伟和颁发奖状。奖状上写道：“在党史工作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秉笔直书，存真求实，为立准立好党史资料做出了显著成绩。”

1986年4月始，六安地委开展组织史资料征集工作。12月24日，已经离休4年的雷伟和参加地区召开的组织史资料编研会议。会上，各县在汇报工作进展时摆出了不少困难。在听了汇报后，雷伟和着重讲了“如何对待工作中的困难”这一问题。他说：“做什么工作都有困难，问题是我们怎么看、怎么办？编写皖西革命斗争史这些年，都是在克服困难中走过来的，现在不是已经编出来就要出版了吗？现在编写组织史，也会遇到困难，我们这次开会也就是为了克服困难。各县搞协作，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措施。”雷伟和还说：“你们在汇报中都讲县委如何如何重视，可是你出的成果呢？光讲重视不行，要看成果。出了成果，才说明县委重视。究竟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搞得怎么样，还要看能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各县组织史的征集和编辑工作。雷伟和逝世两年后，1995年6月，《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六安地区组织史资料》编成，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张正耀 编著)

追忆开国中将梁从学

张应好

梁从学(1903-1973)，今六安市裕安区分路口镇人。经历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奋战在华东、华中战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建国后曾任完皖北军区司令，中央军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03年5月的一天，六安县淠联乡(今六安市裕安区分路口镇)武陟山山脚下一户农家的茅草房中，传出高亢的婴儿啼哭声，这是世代务农老实厚道的梁体善家，今天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尽管家境贫寒，但在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梁体善苍老愁苦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一丝难以掩饰的笑意。虽然明知没有能力供孩子上学读书，但梁体善仍给长子起名为从学，渴望他能够读书成才，走出穷山背凹。

和绝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一样，9岁的梁从学不得不到附近一户地主家放牛，以谋求活路。稍大点，他又去地主家当雇工，烧酒、做挂面。正当前途一片渺茫，六安党组织派人来到武陟山开展农民运动，这给当地贫苦农民带来了希望。已长成大小伙的梁从学很快加入农会，并于1929年光荣入党。走上革命道路后的梁从学作战勇猛，每战必冲锋在前，令敌胆寒，先后9次身负重伤，身上留下13个枪眼，人送名号“梁老虎”。这里讲述一则关于他“智接中央特使”的传奇故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长征胜利。党中央派出特使前往鄂豫皖边区，试图联系一直在当地坚持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八军，但得到消息的敌人却抢先展开了对红二十八军的清剿，并切断了地下交通线。先后派出接应中央特使的两支小分队都杳无音讯，情况十分危急，必须及时找到中央特使，与中央取得联系。这时，大家想到只有一个人能完成此项重大任务，那就是“梁老虎”。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指示，由于梁从学(1934年9月，梁从学在“肃反”中被诬为“第三党”，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职务被撤消，下放到交通队做苦工。)在胡工寨战斗中身负重伤，组织上决定让他留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区再次组建，梁从学因战功被任命为第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团长。为接应中央特使，梁老虎被急调下山。梁从学带领一支由警卫员小秀、老兵冯老改、手枪排长霍金刚及10余名手枪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出潜山、下平原，悄无声息到达黄石镇，安顿下来后，焦急地等待着中央特使的到来。交通员方桐生来到预先确定好的不来茶庄，等待特使前来接头，梁从学则带领小分队前往渡口接应。可此时交通站已被叛徒出卖，特务早就在茶庄内布下了天罗地网。机警的方桐生发现茶庄内设下的陷阱，为了保护特使，同时告知梁团长，毅然不顾自身安危掏出怀中的手枪，抬手就是一枪，一声清脆的枪声从茶庄里传了出来，刚到茶庄门前的特使一惊，明白情况不妙，急忙转身撤离。

“不好！有埋伏……”梁老虎听到枪声，知道接头地点已经暴露，急忙带着队员冲向茶庄。但此时，激烈的枪战已在茶庄中展开，方桐生势单力薄，很快弹尽被俘。待大家赶到，已人去室空。后经打听得知方桐生被特务送至千山关国民党看守所，整个黄石镇也被敌人封锁。

当时与中央特使的联络暗号只有方桐生一个人知道，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与特使接头，届时特使将返回中央。为此，梁老虎和小分队必须紧急制定营救计划。

恰在这时，枫角寨义军人称“火凤凰”的大当家(女)也来到黄石镇，因其二当家也被抓到千山关，和方桐生关押在同一个地方。火凤凰约千山关队长吴二顺在客栈碰头，试图收买吴二顺，营救二当家。梁从学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立即决定与火凤凰合作。经过商谈，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着手研究营救方案，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经过缜密侦查，最后决定还是通过武力。

梁老虎率领小分队伪装成省防局人员，混入千山关，一番激战之后，成功攻下千山关，救出方桐生和枫角寨二当家，但火凤凰却不幸被俘。在千山关看守所，小分队发现原先派出去的两支失去联系的小分队共33名同志的遗体，由于叛徒出卖，已全部被害。大家义愤填膺，悲痛欲绝。但严峻形势不容耽搁，当务之急必须立即接到特使。

救出方桐生后，梁老虎得知还有一个备用联络点——黄石镇正元堂药铺。因省城交通站遭到破坏，上级重新派来一位接应的总站长，总站长以省城名医倪金墨的身份赶来接头地点黄石镇正元堂药铺，接应中央特使。但真正的倪金墨由于叛徒告密，已于年初被捕并惨遭杀害。敌人于是设下圈套，让反动分子金世杰假扮倪金墨，金世杰秘密通知鄂豫皖“清剿”指挥部，让他们在杨家桥设下埋伏，假借特使名义，把山上的红二四四团团骗下山，全歼梁老虎和火凤凰的队伍，行一石三鸟之计。但梁老虎可不是只会拼命的莽夫，经过这些年的革命磨练，特别是这场复杂的斗争较量，他已成长为一位出色的红军指挥员，勇敢而机智，胆大而心细。弄清敌情，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梁老虎通过周密的侦察，识破了敌人的奸计，沉着应对，将计就计，巧设“计中计”，救出火凤凰，智取杨家桥，并安排火凤凰连夜火速回山搬兵。

第二天一早，梁老虎和金世杰展开一场精彩的短兵相接，而就在此时，方桐生也成功地接到中央特派员王海同志。

但就在大家认为任务已圆满解决，准备上山的时候，突然激烈的枪声在黄石镇上空响起，国民党增援部队冲了进来，梁老虎的小分队和特使都被包围了。在这情况万分危急的生死关头，火凤凰带着枫角寨的义军赶到了，激烈的战斗中，为掩护负伤的梁老虎撤退，火凤凰留下掩护，也身负重伤，最后被老乡救起。伤愈后，火凤凰率领枫角寨全体义军参加了红军。

梁老虎胜利接回中央特使，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遵照中央指示，梁老虎率领部队东突西进，或南或北，成功跳出敌军的层层封锁，如同下山猛虎，转战于太湖、怀宁、潜山等地区，奔袭百余里，连克潜山黄泥港和怀宁三桥头、王家河、小市岗以及安庆北部重镇高河埠五镇，歼灭国民党多股武装，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兵锋直逼蒋家王朝的安徽省国民政府所在地安庆，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随后，梁老虎又先后指挥了定远大桥集、泗阳陈道口、定远王子城、全椒周家岗等数十次战斗，使党和红军在鄂豫皖边区的影响更加扩大，坚定了鄂豫皖边区军民革命必胜的信念。

1973年4月7日，梁从学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70岁。直到去世，他的脑部还留有一块弹片没能取出来。追悼会上，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夺为梁从学送上挽联：“农民暴动当红军，舍生忘死战一生。能上能下胸如海，戎马一生欲何求。方山远望金牛山，大桥飘香万古留。写成青史漫悠悠，奋起旌旗是英雄。”

无数革命先辈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换来了今天中国的复兴。而我们对革命先辈最好的纪念，就是赓续他们的精神，创造出不负革命先辈、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辉煌。